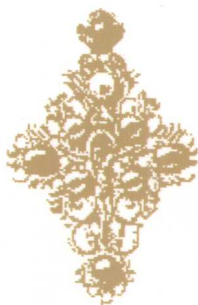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研究
丛书

西方悲剧的 中国式批判

何辉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
丛书

西方悲剧的 中国式批判

何辉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批判/何辉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004-6439-6

I. 西… II. 何… III. 悲剧—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I50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217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责任校对 刘 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印 张 8.37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树的叶子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于仔细观察的人来说，每片都是唯一的，都拥有一些别的树叶所没有的特征。为了把这个问题提升为学术话题，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创造了差异性、多元性、碎片、非连贯性、小叙事等概念来阐释这个道理，尖锐地批评了普遍性、总体性、完整性、有机性、连贯性等宏大概念。这些论著的意义不容置疑。但过于强调这一方面，容易使人们忽视另一面。假如真的没有共性，我们能够把树上的片状的东西叫做树叶吗？或者说，树叶这个词语能够存在吗？可见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并存的，两者不可偏废。

辩证地看到了事物的两面性，才敢斗胆选择这么一个大题目作为自己的书名。西方这一概念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国家和悠久的历史，但某些共性肯定存在，否则这个词本身就不可能出现。同样的道理，西方悲剧作为一个概念也必然有某些相同点，不然的话人们无法凭空创造这么一个词语。面对后现代主义者对类型（genre）的严厉批判，美国文学批评家科恩曾说：“如果所有的作品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必要有类型。如果每部作品都和别的著作完全不一样，也没有必要有类型，甚至无法沟通。”^① 他的观

^① Ralph Cohen, “Do Postmodern Genres Exist”, 乔国强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8页。

点对于我们研究西方悲剧这一类型很有启发意义，有利于避免走向极端。研究特殊性的时候，我们不应否定共性，给总体性的研究留下空间；在探讨共性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特殊性，不要把共同点绝对化。钱钟书曾说：“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桃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的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①可见全书的思想内容和个别字之意思的关系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处于有益的“阐释之循环”之中。任何一个小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宏大叙事无法穷尽一切细节就加以否定；完全离开宏大叙事，对个体的理解也不可能。具体某一部西方悲剧和作为整体的西方悲剧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只有把两者置于“阐释之循环”之中，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理。在人们如此重视个性的今天，这种总体性的研究反而显得尤为重要。

虽说共性和个性同样具有合法性，但为了使这一研究更具可操作性，我们还是对研究范围做了一定的限制。本书探讨的悲剧，是狭义的，即戏剧中的悲剧，把带有悲剧色彩的小说和诗歌排除在外；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规定，不包括20世纪的悲剧，因为这个时段的作品往往带有反传统的色彩。在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時候，还做了更具体的限制，如讨论命运观的时候，仅仅选择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1页。

了古希腊悲剧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话，既肯定了西方悲剧的某些共性，又适当地避免了过大的论述视角。

在讨论了研究对象之后，还得谈一谈研究方法。从字面上看，“中国式批判”应当涉及中国学术方法这一整体。但并非所有的中国方法都能运用于西方悲剧批评，所以还得有个取舍。更重要的是，笔者国学功底不是很好，只阅读了非常有限的典籍，无法对中国学术从宏观上进行归纳，只能聚焦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孔子和庄子的有关论述上。这不是说，除了这两位伟人的思想之外，别的智慧无法运用于西方悲剧评论。我们深信这一研究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拓宽这一领域，也希望有识之士参与进来。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没有把方法论限制得那么死。

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那就是中国智慧和西方悲剧之间是否具有对话的可能性。20世纪以来，大学问家纷纷将西学运用于国学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已经在中西学术之间开凿了一条大运河，证明了中西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西学可以顺着这条运河东渐，中学为什么不能借用这条运河西进呢？纯粹从学理上看，这不是不可能。为什么人们还迟迟没有这样做呢？我们的国门曾经被西方人攻破，我们的经济不如别人发达，我们的心理防线也因此被攻破了，以为本国的方法肯定不如别人。可见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心理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国人必然能够逐步摆脱这种心理障碍。

当然，运用中国智慧批评西方悲剧还只是处于开创阶段，不可能完全避免不成熟之处。再说笔者才疏学浅，难以完全胜任这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书中差错自然不少，请读者多多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悲剧研究的地位和方法	(1)
一 西学研究的地位	(1)
二 以西格西的方法	(3)
三 以西格中的方法	(7)
四 以中格西的方法	(13)
五 三种方法的相互关系	(17)
六 三种方法的历史考察	(19)
七 西方悲剧研究的状况及其可能的增长点	(26)
第二章 西方悲剧的中庸式批判	(33)
一 悲剧人物不能执两用中	(33)
二 悲剧人物不能保持时中	(36)
三 悲剧行动难而易	(40)
四 悲剧人物不能坚持和而不同	(42)
五 悲剧破坏了中和的状态	(44)
第三章 通过孔子的命运观重读古希腊悲剧	(47)
一 敬鬼神而远之	(47)
二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51)

三	亡之，命矣夫	(53)
四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56)
五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58)
六	不怨天，不尤人	(60)
第四章 透过孔子的忧患意识重新评价		
	西方的悲剧意识	(63)
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65)
二	君子忧道不忧贫	(67)
三	暴虎冯河，死而不悔	(74)
四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76)
五	道之将废也，命也	(79)
六	结论	(80)
第五章 通过孔子的道德观看古希腊悲剧中的善		
一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83)
二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88)
三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92)
第六章 透过庄子的认识论解读西方		
	悲剧人物的宏伟理想	(98)
一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98)
二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104)
三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109)
四	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114)
五	万化而未始有极	(119)
六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123)
第七章 试用庄子的生存智慧剖析西方悲剧行动		
一	故其杀者，逆也	(129)
二	族庖月更刀，折也	(135)

三	力竭必败	(140)
四	不能做到呆若木鸡	(143)
五	操之则栗, 舍之则悲	(147)
六	西方人在政治领域对类似现象的批评	(150)
第八章	以庄子的生死观释西方悲剧的生死问题	(154)
一	欲恶之孽为性	(154)
二	离名(利)轻死	(160)
三	未终其天年, 而中道已夭于斧斤	(164)
四	是其所美者为神奇, 其所恶者为臭腐	(167)
五	视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	(173)
六	在上为乌鸢食, 在下为蝼蚁食	(178)
第九章	以庄子的人格观析西方悲剧英雄	(181)
一	外直内曲	(182)
二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亡	(186)
三	以出乎众为心也	(190)
四	不能以无为为常	(194)
五	其耆欲深者, 其天机浅	(199)
 附录		
	善恶报应在中西悲剧中的不同命运	(204)
	基督教的罪及其在悲剧中的表现	(219)
	中西戏剧的结构比较	(231)
	参考书目	(248)

第一章

西方悲剧研究的地位和方法

自从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悲剧观撰写《红楼梦评论》以来，许许多多的学者都尝试使用西方悲剧理论来研究中国悲剧，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自觉而系统地利用中国固有的智慧来研究西方悲剧。在输入和输出完全失衡的今天，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反思。我们应该任凭西方强势文化独自主宰世界舞台，还是应该赶快发掘出自己的智慧与他们对话呢？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批判有没有可行性呢？这一研究有没有意义呢？中国人研究西方悲剧的成果首先应当跻身于西方学术界去确定自己的地位，还是应该在中国学术界内部找到自身的位置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谈一谈中国西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因为西方悲剧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对中国西学的基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重新评估西方悲剧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使用中国方法进行悲剧批评的可行性和意义。

一 西学研究的地位

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两个极端：以普遍性为主要特点的自然科学和以个性与差异性为主要特点的艺术。在自然科学中谈论西学、中学之类的问题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些学

科基本上是通用的，不需分出中西。这里所谓的西学主要是指接近艺术这一端的西方人文学科，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多样性和论争性。

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否定西学研究的意义，拒绝向西方学习是非常荒谬的。至于西学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等，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回答。如果从中西学术关系来看，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两个极端：其一，西学是充分现代化的结果，代表着先进的文化，西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全面西化，即用现代文化来代替还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其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本身就是最完美的，无须向西方人学习。当然，真正处在两个极端上的人是几乎没有的，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有着尊重传统的一面，就是在国门被西方人打开之前的最排外的士大夫也不可能完全闭关自守。可见两个相反的极端都同样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要不要西学的问题，而是把它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最为合适。

在谈到西学的地位时，我们可以在王富仁教授的新国学观中找到很好的答案。他说：“‘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① 他还解释说：“我把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② 他的新国学观是针对“旧国学”观提出来的。20世纪国学大师林立，有关国学的定义自然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可能要数章太炎和胡适的定义：前者把研究中国古代正统高雅文化的学问看作“国学”，与“国粹学”相类似；后者把“国学”当作“国故学”，包括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成果。胡适虽然把国学的

①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② 同上。

显地扩大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如今的学术有这么多的领域，而国学概念这么狭窄，必然导致不好的结果。王富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后果：“这就把大量不同学术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者化、异己化了。”^① 在众多被他者化的学者中，首先受害的可能要算研究外国学问的人，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在中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先生特地谈到外国学术的地位，他说：“它们（指研究外国的学问。——引者注）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不是从异域文化的整体中获得的，而是首先在‘国学’这个中国学术整体中获得的。”^② 以前研究外国学问的人常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在外国没有获得什么地位，在国内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王先生的新国学观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学一旦被纳入到国学的范畴，有利于为本国输入最有意义的外国学问，有利于将西学拿来分析和改造中国学术，也有利于把西学研究出特色来，以区别于西方西学，并真正引起外国人的重视。

西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三种：以西格西的方法、以西格中的方法和以中格西的方法。下文将深入探讨这三种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将西学纳入国学的意义。

二 以西格西的方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西学，我们完全有必要暂时忘记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尽量设身处地地投入到外国人的天地中去。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应当认真学习西方人的语言。学习西学，如果只能阅

①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② 同上。

读翻译过的著作，多少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但只学语言也不够，有的人在听、说、读、写方面似乎都很好，却无法读懂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因为只学了一些没有内容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这种只重语言形式的训练在外语学习的早期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只是止步于此，结果只能是文字扫盲了，而文化上却跟不上去。如要真的以西格西，就得在掌握了语言的前提下，不断地探索他们的思想和文化，逐步摆脱自己的偏见，慢慢地接近西学的真谛。邓晓芒先生曾说，西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达西方思维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精义。根据现代解释学，这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接近而不可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有这个目标是不同的，‘六经注我’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只能是走向‘我注六经’的道路上的一些路标”^①。如果想学好西学的确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以便取得西天的真经。只有这样才能为国人打开比较客观地通向西学的窗口，否则就会以自己的偏见代替外国的学问，甚至排挤西学，走向封闭。

理论上说，学习西学都应当尽量登堂入室，直接进入最高的境界，以便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但实际上真正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如果想超越西方国家的本土研究者，起码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占有的资料不少于甚至超过外国人、对相关现象的领悟能力不低于甚至超过外国人。在资料占有方面，本土的研究者占有绝对的优势，上自原始的手稿，下至当代最新的论著，几乎都在本土研究者可及的范围之内。而我们手头能及的资料有多少呢？大家心里都明白，可能只是不想说穿。在领悟能力方面，他们也有着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对微观的单词、句子、标点等的理

① 邓晓芒：《融通还是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解，还是对宏观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的把握，他们都得天独厚。而且领悟能力的局限性，也直接影响到资料的占有。假如资料的拥有仅仅指外在的物质层面的获取，只要有钱，经常出国，多购外文图书，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情况远非这么简单，领悟力方面的挑战甚至更大。一个美国学者和一个中国学者同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英文资料，所收获的信息量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可能一目十行，后者可能十目一行。就算有人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困难，但西学是不停地发展的，身处国内的学者要跟上西学的发展节奏也不容易。冯黎明在谈到汉语文论的现代化时曾说：“问题的麻烦在于，倘若作为目标的西方现代化是一个恒定的存在，那么学习和引进也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在一段时间内大功告成，但西方现代化偏偏不断变化，在我们以它为目标的学习过程中它自身也不断进步、变动，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多向飞碟射击运动员，渴望准确地击中目标又紧张地期待着下一个目标的出现。”^①这样的话西方人总是在领跑，我们总要落后一截，难以达到与西方人并驾齐驱的水平。就算一个人拥有非常好的外文图书馆，具有出众的天赋和勤奋学习的精神，勉强赶得上西方学术的节奏，但纯粹从西学的视角看，要达到外国人的三流水平已非易事，最乐观的估计也不可能超越二流水平，难以成就大事业。

纯粹的以西格西的研究不仅仅在国际上不如西方人，对本国的意义也不会很大。黔之驴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正视本土的需要而引进的东西不会有多大的用途，甚至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结果只能像那头倒霉的驴一样，“无可用，放之山下”。人

^① 冯黎明：《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汉语文论的两难处境》，《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国外可以造成一些影响的研究未必能够引起国内的重视。在国外有影响的成果是经常出现的，但真正能够影响到国内的只是少部分，只有那些与国内的情况有一定联系的成果才能较容易地进入国人的视野。所以一味地以西格西，外不能进入一流的行列，内不能为本国所用，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然而，一旦将西学纳入到国学的范畴，以西格西的西学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王富仁教授曾说：“文化、学术，不像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起跑的赛跑，有一个绝对的高度，它是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基本尺度的。那些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发展的人物及其作品，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的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我们没有理由替他们自卑自贱，更没有理由拿着刚从国外接受来的一点新知识与新思想而傲视他们、俯视他们。”^①王教授把西学纳入到国学之后，评价的尺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中国学术的推动和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成为最基本的标准。这样的话，情况就彻底改变了，西学研究者不再是与中国学术无关的他者，而是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中流砥柱之一，没有了他们中国人就会缺少面向西方的窗口，中国学术就会失去通往西学的大门，中国社会就会走向闭关自守。这样一来，西学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只要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中国的学术大家，用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观来衡量，就是国学大师，虽然其领域不是中国的传统学问。有了这样的定位，再也没有必要在西方学者面前感到心虚了，就算纯粹的西学不如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

^①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把中国的西学纳入到国学中来，并非要取消以西格西的方法，甚至取消西学本身，否则就会因为自我封闭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多人认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闭关自守的，但也有些人不这么认为。李泽厚是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曾说：“中国实用理性不仅善于接收、吸取外来事物，而且同时也乐于和易于改换、变易、同化它们，让一切外来的事物、思想逐渐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把它们安放在自己原有体系的特定部位上，模糊和销蚀掉那些与本系统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成分、因素，从而使之丧失原意。”^① 李泽厚虽然肯定了中国古人开放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式开放的问题，那就是不容易按照外国的东西的本来面貌学习和吸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闭关自守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李泽厚所说的问题仍然影响着中国学术界，主要体现在以西格西的功夫不够，学人家的东西学得不地道，没有真正做到入乎其内，运用起来容易走样。可见以西格西的方法还需要强化。但作为学习方法之一的以西格西与作为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的以西格西应当区别开来，前者应当加以推广，后者不宜过多强调。总之，以西格西的研究应当纳入到国学之中，是西学进入国学的途径，是发展国学的必要部分。当然，对中国的影响大与学术水平高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只靠这一种研究途径肯定无法使中国学术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 以西格中的方法

以西格西的研究可以较为客观地将西学输入，其目的当然是在中国加以使用和发展。这就必然促使以西格中的方法的产

^①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页。

生。虽说在国内研究西学有很多困难，但换个角度看，缺点就会变成优点。在掌握了与本土学术大异其趣的西学之后，我们可以把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到中国学术研究中来，一块无限广阔的新大陆就会在研究者面前出现，真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以西格中的方法，人们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自从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撰写《红楼梦评论》以来，已经出版了无数的论著。只要我们随便翻阅一下 20 世纪有影响的著作，往往都带有以西格中的特点，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都与西学相联系。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西学东渐史。直到今天，这种研究风气仍然非常强劲。随便浏览一下人文社科类的书刊，就可以看到诸如用存在主义理论研究庄子或者用解构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小说的论著。这种研究涉及中外两种学问，在给本国学术研究带来新的视野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外国的学术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以西格中的高手往往能够将中西学术自然地融为一体，达到浑然天成的地步，以至于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与西学没有多少关系。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其中包括外国学术的成分也不少。以西格中的出色研究者都有着良好的西学修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国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学术体系、研究方法等都与外国学术有一定的联系。他们能够促使中国学术研究走向现代化，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外国学术的基本功。当然，他们的著作中直接论述外国学问的显性研究是比较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外国学术的功夫是隐性的，就好像沉在水下的巨大体积的冰山一样，虽然看不见，却是水上面的冰山具有无穷威力的原因。能够把外国学问的锋芒隐藏起来的人，